

明清时期新会陈皮与化州橘红的道地药材建构

——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郭幼为 王 微

提 要：对于柑橘，一般认为出现的时间为先有橘后有柑，柑较受欢迎，陈橘皮（陈皮）的药用价值则更高。早在《神农本草经》时代，橘柚（皮）已见诸记载并已具养生食疗之效。从南朝到明代柑橘入药渐次开展，到《本草纲目》柑橘橙柚的药用体系搭建完毕，在药疗和食疗方面影响深远。明以后“广陈皮”作为道地药材被医家广泛认可和使用。清以后受商业贸易、地方宣传等因素影响，新会陈皮与化州橘红脱颖而出成为橘柚（皮）中家喻户晓的道地药材。

关键词：柑橘 橘皮 新会陈皮 化州橘红 道地药材

“道地药材”也称“地道药材”，指的是特定产地的质优效佳的中药材。其中“道地”一词约出自东汉已有行政区划的含义。南朝时，陶弘景关于非地道药材和伪药的论述作为医家重视道地药材的开始。唐代，药物产地划分已初显规模。到了南宋，“道地”与各种药材名称合用。明代，专有名词“道地药材”正式出现。清代，将“道地”视为“特定产地的药材质量优良”的说法广泛普及。^①“道地药材”既是中医药文化的精华所在，亦能反映时代与社会的变迁。

中国是柑橘原产地之一，柑橘的人工栽培历史悠久。^②西汉时南方便有人工栽植橘树的记载：“蜀、汉、江陵千树橘，其人与千户侯等。”^③柑橘很早便成为地方的土贡^④，西汉时中央政府设置专职“橘官”^⑤来保障宫廷的柑橘供应，东汉时赏赐归附的南匈奴橙、橘等以示恩宠并定为常例。^⑥学界对历史上中国柑橘的研究多集中在柑橘的经济方面，涉及栽培、消费、商品化等。^⑦对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晋唐以来廿五种道地植物药的形成本研究”（项目批准号：23YJC77000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3批面上资助课题“宋元以来若干植物药的本草书写与道地药材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2023M731317）、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4年度学科共建项目“汉代以来广东地区若干植物药的本草知识书写与道地药材建构研究（公元前202—公元1840）”（项目批准号：GD24XZL01）的阶段性成果。

- ① 参见黄璐琦、张瑞贤主编：《道地药材理论与文献研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18—19页。
- ② 按李时珍对柑橘橙柚的分类，“橙乃橘属，柚乃柑属”，本文所言的柑橘也包括橙柚。参见李时珍编纂，刘衡如、刘山永校注：《本草纲目》（下册）卷30，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1204页。
- ③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10册，第3272页。
- ④ 参见李民、王健撰：《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3页。
- ⑤ 参见《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中华书局，1964年标点本，第1603页。
- ⑥ 参见《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2944页。
- ⑦ 参见满志敏：《历史时期柑橘种植北界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魏华仙：《宋代四类物品的产和消费研究》，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曾雄生：《从洞庭橘到温州柑——宋代柑橘史的考察》，《中国农史》2018年第2期；钱源初：《清代化州橘红的种植与经营》，《古今农业》2019年第2期；张凤岐：《文化、市场与技术：10—13世纪柑橘在中国的扩张》，《中国农史》2022年第5期。

柑橘的药用方面多涉及陈皮的本草考证与道地药名出现年代^①，对其药用历史以及道地药材形成过程则语焉不详。相较于柑橘悠久的食用历史和人工栽培史，柑橘入药及普及的时间要晚，两汉时橘柚（皮）已开始入药，但当时并非常用药，魏晋时陈橘皮开始在方书中出现，且含有橘皮的汤剂在晋唐方书记载中逐渐增多。^② 唐代橘皮加工方法也有发展，其食疗价值逐渐被挖掘。入宋后青橘皮和橘红的提法出现，人们也逐渐开始区分陈皮、青橘皮以及橘红。明清时广陈皮、新会陈皮与化州橘红能作为道地药材异军突起，与商业往来和地方志的宣传有很大关系。本文尝试对以下两方面问题给予解答：随着人们对柑橘的区分逐渐明确，本草典籍中柑橘（皮）的本草知识书写有怎样的变化；明清时期道地药材出现后，商业贸易和地方文化在橘（柚）皮的道地药材建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一 从《神农本草经》到《本草纲目》：汉明间柑橘橙柚的本草知识书写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饮食结构中水果的重要性，南朝陶弘景的药品分类中，果药即是其中一种。橘柚（一名橘皮）最早收录在两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③ 中，从“通神明”来看，橘柚已具有养生食疗的功效。含有橘皮的汤剂以及只含有橘皮一味药的单方在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有所记录。^④ 在魏晋时陈橘皮出现在《肘后方》等方书中。^⑤ 南朝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对橘柚相关信息的介绍显然具有开创性：首先，陶弘景认为《神农本草经》中关于橘柚药效的记录多为“其皮功耳”，间接指出橘柚实际是橘皮；其次，点出橘皮之中以“陈者为良”即之后经常在方剂中见到的陈皮；最后，指出橘皮“通神”“轻身”“长年”的养生功效，也点出其产地“生江南”^⑥。

入唐后，苏颂的《新修本草》并未对橘柚的名称做出解释，只是对柚子皮与橘皮作了区分，并引用《吕氏春秋》、郭璞、孔安国等说法来说明柚子由来已久，且与橘在个头上有所不同，“柚子大，橘子小”。实际上，时人也分不清柚子和橙子，“今俗人或谓橙为柚，非也”^⑦。随着唐开元十七年（729）大庾岭新路的开辟，越来越多岭南植物进入中原人视野。^⑧ 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便首次记录朱柑、乳柑、黄柑、石柑、沙柑等皮都可入药，但以乳柑最好。^⑨ 唐时橘皮可疗病已成共识，徐成便有诗曰，“识得寻常病，便须用橘皮”^⑩。而用橘皮汤来疗噎看来在唐高宗

① 参见魏莹、杨安金、骆利平等：《陈皮本草考证》，《井冈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年第4期；屈杰、韦长林、李培陈：《陈皮本草考证及功用商榷》，《亚太传统医药》2015年第16期；赖昌林、吴鸿、倪根金：《中药广陈皮与新会皮药名出现年代考》，《中国中药杂志》2017年第4期。

② 方书即方剂学著作，传统上习惯称为“方书”，意即专门记载治病的药方即方剂的著作。“方书”取名绝大多数以“方”名书，如《肘后备急方》《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方》《传信方》等。

③ 参见马继兴主编：《神农本草经辑注》卷2，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100页。

④ 参见张仲景撰，何任、何若苹整理：《金匮要略》卷上、下，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

⑤ 参见葛洪原著，陶弘景增补，尚志钧辑校：《补辑肘后方》，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101页。

⑥ 陶弘景编，尚志钧、尚元胜辑校：《本草经集注》卷3，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第230页；陶弘景撰，尚志钧辑校，尚元胜、尚元藕、黄自冲整理：《名医别录（辑校本）》卷1，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第75—76页。

⑦ 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卷12，安徽科技出版社，2004年，第184页。

⑧ 参见于赓哲：《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81页。

⑨ 参见陈藏器撰，尚志钧辑释：《本草拾遗辑释》卷8，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381页。

⑩ 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第1750页。

时期的民间药效良好，所以才会被当时朝廷刻在龙门石窟药方洞上。^①

宋以后柑橘的本草知识书写出现一些变化。首先，到了北宋，大如冬瓜的柚子已经是“闽中、岭外、江南皆有”，但经过长时间的药用实验，柚子皮仍然是“不堪入药”^②。寇宗奭怀疑《神农本草经》等本草典籍记录的橘柚可能是橘皮——“柚”字只不过是“柚字为误”，并告诫世人因为柚子皮无法入药，要区别柚子皮和橘皮，否则会“贻无穷之患”^③。其次，“青橘皮古无用者，至宋时医家始用之”^④。北宋始入药的橘变为黄橘、青橘，黄橘即北宋以前本草典籍中记录的橘，“以陈久者入药良，古今方书用之最多，亦有单服者”。而青橘“与旧说大小苦辛不类，则别是一种耳”，且青橘药效也不同。此外，橘子入药部分除橘皮，还有橘核，北宋时期人们已经取橘核作涂面药。^⑤最后，北宋时期第一次出现橘红。据北宋方勺《泊宅编》记载，橘红为橘皮去瓢，用橘红熬制的橘红汤“治痰特有验”^⑥。到了南宋，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柑橘专著《橘录》问世，也称《永嘉橘录》，其作者韩彦直第一次对柑橘橙柚进行科学分类：将柑橘类分为“柑”、“橘”和“橙子之属类橘者”三个大类，其中柑类又细分为8种，橘类细分为14种，“橙子之属类橘者”细分为5种，合计27种。在此基础上他指出，“朱栾（皮）”“香圆（叶）”“枸橘”可入药。同时，他亦简要说明了（黄）橘皮、橘红、青橘皮之间的药效区别。^⑦之后元明间已经基本能说清橘红、青橘皮、陈皮之间的区别，“青皮小而未成熟，成熟而大者橘也，色红故名红皮，日久者佳，故名陈皮”，“青皮、陈皮一种”，“陈皮治高，青皮治低”^⑧。到了晚明时期，李时珍将橘的药用分为黄橘皮、青橘皮、橘瓢上筋膜、橘核、橘叶；将柑的药用分为柑皮、柑核、柑叶；将橙的药用分为橙皮、橙核；将柚的药用分为柚皮、柚叶、柚花等。至此，橘柑橙柚的药用体系正式搭建形成并影响至今。^⑨

二 从广陈皮到新会陈皮：明清间陈皮的道地药材建构

到了明朝后期，医药分业更加成熟，医、药的分离和专业化程度更加显著。^⑩受这种趋势的影响，本草典籍逐渐淡化产地书写，而地方志等载体则接替了早期本草书写具备的叙事内容，留有这一时期药物的生境和状貌以及道地药材形成因素。也是在明代以后，广橘开始播名天下。^⑪而伴随着道地药材成为优质纯真药材的专用名词后广陈皮便脱颖而出。最早将橘皮的道地性记录在册的是成书于公元1505年的《本草品汇精要》，广陈皮在明代之前的文献中没有出现过^⑫。在

① 参见张瑞贤主编：《龙门药方释疑》，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9、67—76页。

② 苏颂编撰，尚志钧辑校：《本草图经（辑校本）》卷16，学苑出版社，2017年，第529页。

③ 寇宗奭撰：《本草衍义》卷18，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21页。

④ 李时珍编纂，刘衡如、刘山永校注：《本草纲目》（下册）卷30，第1201页。

⑤ 参见苏颂编撰，尚志钧辑校：《本草图经》（辑校本）卷16，第529页。

⑥ 方勺：《泊宅编》卷2，朱易安、傅璇琮编：《全宋笔记》第2编，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204页。

⑦ 参见韩彦直撰，彭世奖校注：《橘录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第18、19、26页。

⑧ 王好古著，竹剑平主校：《汤液本草》卷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年，第122—123页；陈嘉谟撰，张印生、韩学杰、赵慧玲校注：《本草蒙筌》卷7，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5—286页。

⑨ 参见李时珍编纂，刘衡如、刘山永校注：《本草纲目》（下册）卷30，第1199—1205页。

⑩ 参见边和：《谁主药室：中国古代医药分业历程的再探讨》，余新忠主编：《新史学》（卷9），中华书局，2017年，第38—72页。

⑪ 参见凌蒙初：《拍案惊奇》，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6页。

⑫ 参见赖昌林、吴鸿、倪根金：《中药广陈皮与新会皮药名出现年代考》，《中国中药杂志》2017年第4期。

该典籍中,橘皮的道地产区为广东。^①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介绍橘皮时亦言道,“今天下多以广中来者为胜,江西者次之”^②,并且在转引南宋医方《斋百一选方》时将其中真橘皮改为广陈皮。李时珍改真橘皮为道地药材广陈皮,足见明时广陈皮这个叫法相当普遍。缪希雍在其另一部医学著作《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中也录有一些含有广陈皮的方剂。^③明代黄一龙修广东《潮阳县志》言道,“陈皮即广陈皮,产于此者特佳”^④。到了清代,本草典籍沿袭陈皮“广中者最佳”^⑤的说法。康熙年间广东肇庆府、廉州府、罗定州的特产“药之属”中也有陈皮的记载。^⑥而清代地方志则将广陈皮由“广中陈久者良”助推到“粤中药材称为第一”的地位。^⑦

在广陈皮享誉全国的同时,清代陈皮的道地药材中出现了新会陈皮。新会之名最早出现在南朝宋永初元年(420),隋朝时改新会郡为新会县,从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始,新会先后隶属广州(五代、宋)、广州路(元)、广州府(明清)。^⑧而新会之地种植柑橘的历史要追溯到北宋时期,该时它属广州南海郡。北宋人庄绰在《鸡肋编》便有“广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种柑橘以图利”的记载,当时广南人还发明并售卖一种“养柑蚁”来除柑橘树的虫害。^⑨明朝时,新会柑橘已有具体记载,祖籍广东新会的大儒陈献章在其《陈白沙集》中便有诗描写家乡新会的柑橘,其中《送柑答之》提到新会著名的大红柑,新会陈皮便是大红柑皮晒制而成。^⑩在明万历年的《新会县志》土特产中也有陈皮的记载。^⑪即使如此,明代及以前的典籍著作中几乎没有出现过新会陈皮的称呼。清代的本草典籍和医学著作中才有新会陈皮的记载出现。清代医家张璐在《本经逢原》中写道:“橘皮……产粤东新会,陈久者良。”^⑫咸丰年间,凌奂在《本草害利》中也将广东新会陈皮与福建皮、浙江的衢皮作了一番比较,认为新会陈皮为胜。^⑬清代医家陆以湑在《冷庐杂识》中亦提到新会皮。^⑭而根据《清宫医案研究》记载,当时宫廷御医在开完药方后注明中药的产地在广陈皮下注,“产广东,以新会县署内者最佳”^⑮,说明清时新会皮深得

① 参见刘文泰等纂修,曹晖校注:《本草品汇精要》卷32,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547页。

② 李时珍编纂,刘衡如、刘山永校注:《本草纲目》(下册)卷30,第1199页。

③ 参见缪希雍著,王淑民整理:《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

④ 隆庆《潮阳县志》卷12《物产》,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影印版,第308页。

⑤ 参见李中梓原著,丁甘仁等增撰,耿鉴庭重订:《本草征要》卷1,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第37页;严洁、施雯、洪雯、洪炜同纂,郑金生整理:《得配本草》卷6,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第188页;[日]稻生宣义撰,刘训红、吴昌国、许虎校注:《炮炙全书》卷2,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第59页;张秉成编著:《本草便读》,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109页;杨时泰原著,黄雄、崔晓艳编著:《本草述钩元释义》卷17,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573页。

⑥ 参见康熙《广东通志》卷22《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2册。

⑦ 参见乾隆《番禺县志》卷17《风俗》,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92年,第804页;光绪《潮阳县志》卷12《特产》,“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第12号,第160页。

⑧ 参见道光《广东通志》卷3《沿革》,“中国地方志集成”,第4册,第90页。

⑨ 参见庄绰:《鸡肋编》卷下,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4编7,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03页。

⑩ 参见陈献章:《陈白沙集》卷6—卷8,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69页。

⑪ 参见万历《新会县志》卷2《食货略》,“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37册,第88页。

⑫ 张璐撰,刘从明校注:《本经逢原》卷3,中医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59页。

⑬ 凌奂著:《本草害利》,中医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1页。

⑭ 参见陆以湑著,张向群校注:《冷庐医话》,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第213页。

⑮ 胡世林:《中国道地药材论丛》,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页。

御医和皇家的肯定。清代康乾年间名医士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中陈皮多用“新会皮”^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上海市药材公司合编的《药材资料汇编》按道地产区将广陈皮划为广药类，且将广陈皮习称为新会皮或冈州皮（冈州为当时新会县的江门）。^②

地方志关于新会陈皮的书写则道出了其享誉全国的原因。清代新会本地的县志在沿用明时记载的同时开始夸赞本县的陈皮。^③清道光《新会县志》记载，新会陈皮的售卖方式是用草编绳捆绑销往外省，而销售的主体与新会当时的葵商——“新会宜蒲葵”^④有关，清时新会地区的支柱产业是葵扇业，有大批从事葵扇经营的商人（简称葵商）。从清乾隆时期开始，新会的葵商便兼营新会陈皮，相继开设德隆等9家“隆”字号，在利用自己搭建的销售网络销售葵扇的同时也将新会陈皮销往四川、重庆。^⑤而也在清乾隆时期，专营新会陈皮的店铺如刘怡记等出现，这些专营店通过在各地开设分号将新会陈皮销往全国。^⑥

三 从广橘红到化州橘红：明清时期橘红的道地药材构建

相较于魏晋时出现的陈橘皮，橘红之名出现较晚，到宋时才有。宋时橘红和陈皮为同种，意为橘皮去瓢取红，作下气消痰之用并一直沿用至晚明。明时橘红也出现了道地药材——广橘红，缪希雍在《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中录有一些含有广橘红的方剂。^⑦到了清朝，橘红的另一个道地药材——化州橘红出现，但这种橘红已非橘皮而是柚子皮。^⑧清康熙年间张璐的《本草逢原》记载，“柑皮产广东化州者最胜”，此处的柑皮很可能系指化州橘红。康乾间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已录有一些含有化橘红的方剂。^⑨乾隆朝吴仪洛撰《本草从新》言道，“化州陈皮消甚灵”^⑩。咸丰年间凌奂在《本草害利》中也称：“化州陈皮，消伐太峻，不宜滥用。”^⑪上述《本草逢原》《本草从新》《本草害利》三处所说的化州柑皮、陈皮应都是橘红。这也再次说明，明以后柑皮与橘皮分的并不是很清楚。而乾隆年间赵学敏将化州橘红正式立目单独分出，他还转引《岭南杂记》《关涵岭南随笔》《粤语》《识药辨微》《梁氏家藏方》及《百草镜》等有关化州橘红的记述，其后的本草著作多以此为基础并单独立目。^⑫

① 参见叶天士撰，苏礼等整理：《临证指南医案》卷1、2、4、6、7、10，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年。

② 参见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上海市药材公司：《药材资料汇编》（上集），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

③ 参见乾隆《新会县志》卷6《食货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38册，第187页；道光《新会县志》卷2《物产》，“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第5号，第63页；光绪《新会乡土志》卷14《物产》，粤东编译公司，1935年，第120页。

④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5，中华书局，1985年，第634页。

⑤ 参见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精编·民国时期经济篇》（下编）卷3，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01—102页。

⑥ 参见刘学文主编：《江门中医药文化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2年，第82页。

⑦ 参见缪希雍著，王淑民整理：《先醒斋医学广笔记》。

⑧ 参见钱以垠撰，程明点校：《岭南见闻》卷3，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92页；曹炳章编著，刘德荣点校，陈竹友审订：《增订伪药条辨》，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75页；吴焕等：《化州橘红的本草学研究》，《中药通报》1985年第9期。

⑨ 参见叶天士撰，苏礼等整理：《临证指南医案》卷1、卷3，第6、132页。

⑩ 吴仪洛撰，陆拯等校点：《本草从新》，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第168页。

⑪ 凌奂著：《本草害利》，中医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1页。

⑫ 参见赵学敏著，侯如艳校注：《本草纲目拾遗》卷7，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0年，第279—281页。

医药典籍对化州橘红的记录相对单一,地方志等非医学典籍记录的化州橘红则更为丰富。清初,屈大均说化州橘红已经成为宫廷贡品,更是畅销广东省内外的名优土产。^①清康熙《广东通志》将化州橘红列为广东特产之一并将其与肇庆端砚、增城荔枝等相提并论^②,可见化州橘红在当时知名度很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进单》有化州橘红进贡记载,如乾隆年间两广总督李侍尧,每年冬至例贡老树、署内等化州橘红。^③嘉庆间两广总督吴熊光称“化州橘红,粤东以充贡”^④。在《清宫医案集成》中有使用“署内橘红”的记录,其中清末大太监李莲英医案上写着“本方减广橘红,用署内橘红”,而编者对此按语为,“橘红用署内者,指进药时署明内廷专用之上品”^⑤。连年进贡宫廷,使化州橘红名声大噪。乾隆《化州志》便承认化州橘红为化州地区的道地药材。^⑥清代官员间将化州橘红作为赠礼佳品。清人杨锡绂曾任广东布政使,他便将化州橘红列在《请严禁馈送土产疏》中。^⑦其他如礼部尚书姚文田、状元俞樾、高廉道、陆心源等都曾收到过他人赠送的化州橘红。^⑧

化州橘红的名声远播与化州本地善于利用历史传说和现实需求,通过地方志、橘红诗以及广告册等载体对化州橘红进行道地药材建构有关。先来看地方志和诗歌在宣传化州橘红方面的贡献:首先,附会“石龙”传说。清代化州橘红的宣传是结合当地石龙传说展开的。化州之名,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始有(化州陵水郡),属广南西路;元朝至元十五年(1278)立化州路安抚司,十七年改总管府属海北海南道;明清时化州领吴川、石城二县属高州府。^⑨而据康熙《化州志》记载,明代中期已经有化州是由石龙变化而来的说法。^⑩明代化州地区有诸多名士科举中第也被认为是石龙显灵的结果。^⑪石龙传说在化州流传极广,并不断被附会与纪念,清康熙年间在广东茂名、东莞做过县令的钱以垠在介绍化州橘红时便将其与石龙传说结合,“州产橘红,以廨之苏泽堂二株为最,岁结七八十枚。谓此二株得龙之涎沫灌溉,故精华所结,妙于他树”^⑫。将化州橘红附会在石龙传说,地方志因之。乾隆《高州府志》即说化州苏泽堂处于石龙腹中位置,吸收石龙精华,所以老树苏泽堂产的橘红尤著。这种说法还使当地士人颇有微词,他们不满“区区橘红擅我灵异”。这也从侧面反映化州橘红与石龙传说更进一步的结合。乾隆间高廉分巡道王概曾实地考察化州橘红,明确化州石龙与化州橘红之间的关系是“石龙”

① 参见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5,第632—634页。

② 参见康熙《广东通志》卷22《物产》,“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0册,第1476页。

③ 参见董建中:《李侍尧进贡简论》,《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④ 吴熊光:《伊江笔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15页。

⑤ 陈可冀主编:《清宫医案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71页。

⑥ 参见乾隆《化州志》卷1《舆地》,“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高州府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9册,第211页。

⑦ 参见杨锡绂:《四知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2页。

⑧ 参见姚文田:《邃雅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30页;俞樾:《春在堂诗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43页;陆心源:《仪顾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2页。

⑨ 参见道光《广东通志》卷3《沿革》,“中国地方志集成”,第4册,第95页。

⑩ 参见康熙《化州志》卷12《艺文下》,“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高州府部,第9册,第163页。

⑪ 参见道光《化州志》卷10《艺文》,“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高州府部,第9册,第644、648页;黄鹤仪:《罗江外纪》,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691—692页。

⑫ 钱以垠撰,程明点校:《岭南见闻》卷3,第92页。

精化为老树橘红，位于石龙腹部，作用更佳。^① 清康熙年间还有结合石龙传说宣传化州橘红的“橘红歌”。如清康熙五十二年进士，官至山东道御史人张汉的《橘红歌》，便是借助石龙对化州橘红“伤寒滞食”“蠲痰止咳”功效进行宣传。^② 乾隆朝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援引《梁氏家藏》记录另一首作者佚名的《橘红歌》。^③ 该诗歌也是通过石龙鸣叫传说，强调化州橘红对“伤寒”“积食”以及“消痰止嗽”的疗效。清代上述关于石龙传说和化州橘红的诗歌还有很多^④，实则通过类似今日广告词的形式附会石龙传说为化州橘红作宣传。^⑤ 其次，增加“罗辩”神仙手植橘红的传说。在将化州橘红附会在石龙传说的同时，地方志也记录了一位“罗辩”神仙亲手种植化州橘红。罗辩神仙最早出现在康熙《化州志》中，其言罗辩是遇到仙女刘三妹，服食云母之后成仙^⑥，并未有与化州橘红产生联系。^⑦ 乾隆年间，时任高州与廉州分巡道王概在实地考察化州橘红时便言苏泽堂橘红是由“罗辩仙人”亲手所植在石龙之腹。这应该是化州志中首次将罗辩仙与化州橘红、化州石龙勾连，之后地方志^⑧因之进一步渲染了化州橘红的神奇彩。^⑨ 最后，变龙（仙）为石。无论是化州石龙还是“罗辩仙人”都是神话，并非信史。于是化州橘红疗效显著的另一种说法便是变龙（仙）为地下富含的礞石。陆心源在《仪顾堂集》中认为罗辩种植化州橘红的事实为附会，“橘之所以能治痰者以礞石故，去礞石渐远则其力亦渐微”^⑩，而吴其濬却认为对于化州橘红起作用的是滑石。^⑪ 无论是“礞石”还是“滑石”，对于橘红的生长应均有好处。^⑫ 地方志显然是接受了陆心源的说法，但仍然难以脱离石龙传说，“署中丛橘千头，贡天府，下饶礞石……龙与橘与石自有一气感通”^⑬。清季民初的徐珂在介绍化州橘红时也认为化州橘红“化痰尤验”的原因是“州多青礞石”，但罗辩仙手植橘红于石龙腹中的传说影响太过深远，所以徐氏也将其记录在内，作为区分化州橘红级别的依据。^⑭

① 参见乾隆《高州府志》卷2《舆图》，卷14《艺文二》，“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高州府部，第1册，第403、684—685页。

② 参见张汉：《留砚堂诗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影印版，第576页。

③ 参见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第255页。

④ 参见钱以垠：《研云堂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3页；光绪《化州志》卷11《艺文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高州府部，第10册，第381页；赖蕴山：《橘中人语》，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⑤ 参见黄仲先等：《柑橘文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第206页。

⑥ 参见康熙《化州志》卷10《丘墓》，“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高州府部，第9册，第37页。

⑦ 参见张汉：《留砚堂诗选》，第576页。

⑧ 参见道光《广东通志》卷95《舆地略》，“中国地方志集成”，第6册，第191—192页；光绪《化州志》卷3《建置制》，“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高州府部，第10册，第57页。

⑨ 清康熙年间成书的《岭南杂记》或是最早记录罗辩仙手植化州橘红传说，之后清代一些笔记沿袭该说。参见吴震方：《岭南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25页；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20页；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9页；金武祥：《粟香五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04页。

⑩ 陆心源：《仪顾堂集》，第171页。

⑪ 参见王锦秀、汤彦承、吴征镒著：《〈植物名实图考〉新释》卷25，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第1580—1581页。

⑫ 礞石确有“治积痰惊痫，咳嗽喘急”的疗效。参见李时珍编纂，刘衡如、刘山永校注：《本草纲目》（上册）卷10，第430页。

⑬ 光绪《化州志》卷2《物产》，“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高州府部，第10册，第50页。

⑭ 参见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中华书局，2017年，第12册，第5904页。

在地方志通过建构神话和神仙来宣传化州橘红的同时，化州本地橘红种植园也开始注重宣传自家的橘红，以清末光绪年间赖家园、李家园最具有代表性。事实上，清初化州城内的化州橘红已开始区分不同级别。奉康熙帝命巡视海界的工部尚书杜臻曾在化州留驻，其间他认为化州官署种植的橘红具有显著疗效。^① 官府对官署种植的橘红非常珍视，“每岁结实若干颗，州辄申报宪司”^②。乾隆《化州志》也认为城内官署所产橘红为佳。^③ 而清康熙年间吴震方的《岭南杂记》则明确了城内化州橘红的不同级别，“在苏泽堂者为最，清风楼次之，红树又次之”^④。苏泽堂是官署的一处建筑，清风楼在唐代原名清风堂，红树即学宫之误，三地基本上都属于署内范畴。^⑤ 之后，由于苏泽堂橘红以上贡为主要目标，所以流入市场的化州橘红多为民间赖、李两园所产。清末民间赖家园、李家园所产橘红开始成为化州橘红代表，“官署内苏泽堂者至佳，次则赖家园，又次则李家园”^⑥、“化州橘红……以县署西隅之苏泽堂橘二株为正宗，县署九思轩橘四株次之，民间赖园、李园又次之，至毗城近郊所产则多鱼目混珠者”^⑦。二园所产橘红之所以出名，与他们编印《橘中人语》和《宝山橘话》两个类似广告的小册子来宣传自家所产橘红，争夺化州橘红品牌有关。赖家园编印的《橘中人语》是一大批名士包括阮元、陈兰彬等人的题词及诗歌汇总，目的是利用诗文强调品质，宣传橘红。赖家园也将《橘中人语》赠与顾客浏览，提高其知名度。而眼见阮元等名士为赖家园作记，李家园主人也延请名士为自家橘红题词作诗，编印成《宝山橘话》。^⑧ 所以《宝山橘话》收录的都是为李家园做广告的诗文，如同治四年（1865）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的杨颐撰写的《化州李氏园橘记》，便非常推崇李家园橘红。^⑨ 杨汉章《赖家园阮记辨》便指出杨颐所撰的橘记“语含讥刺，于赖园有微词，似不满于阮记”，并认为原因是“晚近商贾，动法居奇，扬己抑人，眩惑世俗”^⑩，反映赖、李两家互相争夺橘红品牌的现实。现在看赖家园所产的化州橘红更胜一筹。徐珂便称“以赖氏园老树所产者为最佳”^⑪，何廉臣则直接将化州橘红称为“赖橘红”^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上海市药材公司合编的《药材资料汇编》也称化州橘红“以‘赖家园’出产最佳，故其皮有‘赖氏红’之称”^⑬。此外，对于市场上化州橘红制假售假泛滥的

① 参见罗天尺、李调元等撰，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页；杜臻：《粤闽巡视纪略》，文海出版社，1983年，第16页。

② 王士禛：《皇华纪闻》，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388页。

③ 参见乾隆《化州志》卷1《舆地》，“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高州府部，第9册，第211页。

④ 吴震方：《岭南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25页；道光《广东通志》卷95《舆地略》，“中国地方志集成”，第6册，第192页。

⑤ 参见道光《化州志》卷2《建置》，“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高州府部，第9册，第426、50页。

⑥ 黄鹤仪：《罗江外纪》，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449页。

⑦ 民国《广东通志未成稿》卷35《物产五》，“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第23册，第639页。

⑧ 参见吴建新：《岭南历代农、动、植物志叙录》，《农史研究》1990年第9期。

⑨ 参见李翰臣：《宝山橘话》，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黄鹤仪：《罗江外纪》，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657—659页。

⑩ 陈红胜等编：《橘红集》，花城出版社，1989年，第35—36页。

⑪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12册，第5904页。

⑫ 何廉臣：《实验药理学》，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9页。

⑬ 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上海市药材公司：《药材资料汇编》上集，第162页。

情况^①，赖家园、李家园通过编印《橘中人语》和《宝山橘话》来引导顾客前往果园亲自采摘，通过眼见为实屏蔽掉中间商造假来保护化州橘红品牌。

结 语

随着疆域扩大，更多柑橘品种进入中原人视域，汉以来橘柚入药也渐次增多（汉橘皮→晋唐陈橘皮→宋元青橘皮、橘红→明柑橘橙柚皮、核、叶等），反映了从橘柚载于《神农本草经》始，两千年间柑橘的本草知识书写或称为柑橘的入药史受“文化的束缚”，呈现出一种渐进式的过程。商人贸易（葵商搭售新会陈皮）、地方志书写（附会石龙传说、罗辩仙人手植）、当地种植园的广告册（《橘中人语》和《宝山橘话》）等代替了早期本草书写具备的相关内容，共同助推新会陈皮与化州橘红在清代以后脱颖而出，成为至今仍是广东地区家喻户晓的道地药材。这也反映了晚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之后，医与药的分离和专业化程度更加显著，道地药材的形成受医家之外群体的影响也越发突出，环境变化、商业贸易和社会文化等都会作用于道地药材的形成，而药效并非道地药材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作者单位：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方志考稿》正式出版

2024年9月，《方志考稿》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共计35万字。《方志考稿》是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上海通志馆策划的“方志学名著”丛书之一种。是书为民国时期方志学者瞿宣颖所著，是我国近代方志目录提要方面的重要著作。原书于1930年出版，名为《方志考稿（甲集）》，全书分六编，收录直隶、山东、河南、山西、东三省、江苏，考证方志723种，对每种方志的作者、卷次、内容特点进行详细考订。余绍宋曾盛赞是书“体裁既佳，考论亦当，其为不朽之作”。鉴于该书在方志学上的重要价值，编者据天春书社初版《方志考稿（甲集）》进行整理，并增补瞿宣颖《志例丛话》一文。此版《方志考稿》按古籍整理步骤，对照原书所收六地方志，核校引文，注明讹误，修正标点，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方便阅读利用的版本。

^① 参见吴震方：《岭南杂记》，第25页；陆心源：《仪顾堂集》，第171页；吴仪洛撰，陆拯等校点：《本草从新》，第168页；关涵等著，黄国声点校：《岭南随笔（外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1页；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29页；罗天尺、李调元等撰，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402页；梁九图：《十二石山斋诗话》，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第831—832页。